



朝鲜文艺工作者到田间为劳动者加油鼓劲

朝鲜近日举国上下总动员为五月底完成插秧工作而努力。朝鲜各部委、中央机关积极支援农业生产,以保证今年的国内粮食供给。文艺工作者也走到农场中去,站在田间地头热情高歌,为辛苦耕种的劳动者加油鼓劲。



波兰104岁老人百米跑32秒79破纪录

在波兰举行的“男子100米百岁老人竞赛”上,一位104岁老人以32秒79的成绩完成比赛,刷新了欧洲百米最年长参赛选手纪录,成为唯一一个完成赛跑的百岁老人。



日本1对新人 在277米高楼眺望台举办婚礼

18日,位于大阪的日本第一高楼阿倍(高达277米)的58层眺望台上,大阪府一对新人许下了爱的誓言。约580名宾客及游客见证了这次高空婚礼。



母亲替剑桥儿子租女友参加舞会

一位剑桥学霸的母亲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广告——为忙于学业的儿子招一个临时女友,以陪伴儿子参加该校著名的“五月舞会”。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

沿边疆行走2万多公里,用镜头记录独特的边境文化。她的“什么是幸福”的问询,也得到了各种朴实的答案。一位边境商人说:“钱多钱少,常有就好。家穷家富,快乐就好。这就是幸福。你说对吧?”

李海培:行走边疆 问路人生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2009年夏,31岁的女导演李海培放下繁华大都市中的一切,带上摄像机独自上路。历时3个月,沿中国陆地边境行走近22000公里,用镜头记录独特的边境文化,问询人生幸福的答案。全部的积蓄与满腔的热血,换来了8集纪录片《边疆问路》的问世,并在4年后,沉淀为《边疆问路,再不出发就远了》的书稿。

2014年春末,31岁的记者在北京的一间咖啡馆里,听李海培重温31岁时的故事。巧合的年龄、相似的职业、同为新妈妈的生活体验,让这次采访极像是一对久未谋面的姐妹在聊叙别情。

人生十字路口上的抉择

李海培天生一张娃娃脸,目光清澈、嗓音甜软、语言灵动,给人一种珠圆玉润、亲切可爱的感觉,与印象中作风硬朗的女导演相去甚远。

“我是马年的大年初一出生的,我妈戏称我为‘马头’,四处奔波闯荡。但是很多人见了,都觉得很难跟那个走边疆的形象搭在一起。可能因为我是南方人,说话也比较柔,其实我骨子里有一种执着,内心深处对于正能量的爱,很有感应。”李海培解释,笑如银铃。

2000年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李海培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编导。2002年,颇受领导重用的她,却从央视辞职,留学法国,学习大众传媒。2004年回国后,她入职一家外企影视制作公司,做一档世界文化名人访谈栏目。2005年,通过社会招聘进入北京奥组委,负责观众信息方面的服务。工作之余,她拿起摄像机,拍摄完成了她个人的首部独立纪录片《我们曾为奥运工作》。这也让她爱上了这样一种能够展现个人思考的表达方式。

三年后,北京奥组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将解散,奥组委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面临着重新择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李海培有些迷茫,是顺理成章“找个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还房贷、养车、卸掉剩女的帽子,还是有另外的选择呢?”

摆在李海培面前的是两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到北京团市委下面的志愿者联合会做宣传工作,有稳定的编制;去一家海外电视台的驻京制作中心任职,薪水很高。在奥组委工作期间,她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稳定下来,似乎有更好的选择。但她却在犹豫,“这是我想要的人生路吗?”

恰在此时,一个热衷自驾的朋友给她打来电话,说要环中国的陆地边境线走一圈,问她要不要一起拼车。这个提议让热爱旅行、热爱大自然的李海培怦然心动,但是必须准备一大笔路费。“我不是有钱有闲的阶层,得拿自己的积蓄来做这件事。但我决定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拍成一部纪录片,而不仅仅是去自驾游。”

李海培说,“我在国外的时候就特别乐此不疲地介绍中国,我一直在想怎样用影像去展现这个国家,展现这片土地的人和文。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决定要走这趟行程,并给这部片子取了一个名字叫‘边疆问路’。一路上我们肯定会迷路,会问路,但问自然的路同时也是在问自己的人生路。”

边境线上五味杂陈

2009年6月6日,带上行装、药品和祝福,李海培开启边疆之旅。

一路向北,过了鸭绿江入海口,汽车沿中朝边境线奔驰。

往江对岸望去,白色的房子,“二八”自行车,牵着孩子兴奋挥手的农妇,行军拉练的学生,被拉成几道线的边境铁丝网,不断跃入李海培的眼帘。边境线的江水犹如一面镜子,让她不断地对比、观照、反思,心中五味杂陈。

“在吉林省长白县,朝鲜族的司机小金告诉我,他小的时候比对面的朝鲜还穷,肚子吃不饱了,就到对岸的大娘家讨一碗大米饭吃。农村包产到户后,生活逐渐富裕了,他开大卡车跑运输,攒了些钱,买了小轿车开出租。如今,小金给江对岸的朝鲜朋友买了手机,用的是中国的网络,他负责打电话。他们想见面的,就打个电话,约好晚上在江上喝酒。”

李海培感慨,是江对岸曾经帮助过小金的朝鲜新娘,给小金的心里埋下了爱的种子,让



李海培说,问了一路“什么是幸福”,回来后,她才发现一路上都很幸福,“我干了我喜欢的事,我觉得我这辈子没白活。”

他在努力挣钱的时候,不忘力所能及地报恩与施爱。

进入中俄边境,日新月异边境线,繁荣的边境贸易,让李海培换了心情。在中国“雄鸡”版图上,黑龙江省抚远县乌苏镇恰好处于“鸡嘴”部位,是祖国的最东方,在这里可以看到照进中国的第一缕阳光。

“我们住进了全镇唯一的一户人家,镇长就是男主人,唯一的镇民是他的妻子,夫妻俩经营着一家家旅店。驻守边关的哨兵们是他们的近邻。厚厚的纱窗根本挡不住蚊子的袭击,把我们咬得够呛。镇长老婆说,晚上给我们点上蚊香,‘现在的条件就算好的啦,我们点的时候听老人讲,很久以前这一带还有一种刑罚,就是把人绑在白桦林里,三天后,这人就能被蚊子活活咬死,因为毒液太厉害了嘛。’”

镇长老婆原本想表示安慰的话,却让李海培他们不寒而栗。

黑龙江省同江市,是李海培此次边疆之行的转折点。在这里,她终于鼓起勇气,离开了驴友驾驶的越野车,寄回家一个三十斤重的大箱子,轻装简行上路,采访她想采访的人,拍摄她所希望拍摄的故事。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她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宾馆大堂经理小张。

小张是个土生土长的同江人,曾在俄罗斯生活过7年。他告诉李海培,当初去俄罗斯做生意是在新世纪之初,那时俄罗斯的生活用品极度匮乏,给中国商人的签证十分宽松。可跨过乌苏里江,来到陌生的对岸,他发现外国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好,以前远远望见的尖顶小洋楼、小别墅,近看都是破房子,市场上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用三个月时间考察,第一桶金是卖内裤赚的。小张发现那里的人都不穿内裤,也压根儿就不生产这个。他一次性批发了一万元钱的货,竟在一周内售罄,净赚六千元。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小张,风光回乡,给父母买房买车后不久,对岸的一场大火将他所有的货品和现金化为灰烬。29岁的他没有掉泪,打算从头再来,却因卢布连续三年贬值,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直到把灾后剩下的积蓄赔得一干二净。

“我向满脸沧桑的小张,是更感谢俄罗斯这个国家给他带来最初致富的契机,还是更怨恨这一出国淘金之旅给他带来的打击?他长叹一口气说,‘我还是喜欢俄罗斯,并没有怨恨,但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家,只想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

说东北话的蓝眼睛

在中国最北的城市漠河,建筑物也变成了俄罗斯风格。播放着东北二人转的宣传车从建筑前缓慢驶过,土洋结合,有点不伦不类。

李海培走进一个名叫“发妞”的面包店,店里的面点都是俄罗斯风味。“点心师是中俄混血的第三代俄罗斯后裔,店主来自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店主说,在他的家乡,这样的面包店满大街都是,因为距额尔古纳仅四小时车程的边境地区室韦,就有政府为俄罗斯族行政规划的俄罗斯乡,那里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是中俄混血,他们几乎完全保留着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能歌善舞,家家户户都会做正宗的俄罗斯烤面包——列巴。”

来到室韦时,那里正在举行中俄联欢会。江边的小广场上热闹极了,卷发蓝眼的“外国人”,用地道的东北话跟李海培打着招呼。

“这次的联欢活动据说是近百年来中俄两岸共同举行的头一次。过去两岸居民天天隔江相望,却从没有这样正式交流过。如今虽不能随意跨越国界,联欢活动也只是隔着额尔古纳河进行,但毕竟是一次破冰行动,两岸百姓热情高涨。”

在联欢会现场,李海培看见额尔古纳河两岸早已架起大喇叭,联欢会正一边出一个节目交替进行着。好几位扎着花头巾的老奶奶兴奋地抓起话筒冲着对方用俄语大声喊起来,声音激动得发颤,蓝眼睛噙着泪花。“我问老奶奶刚才都跟对岸邻居说什么了,她立马换成了东北味儿的汉语:‘我跟他们说,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对岸,我想他们。我在中国和儿女小孙子生活,欢迎你们到中国来玩儿!’”

随着联欢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两岸百姓唱起了同一首歌——《小路》。有趣的是对岸用俄语,这边用汉语。唱着唱着,两岸的人们开始情不自禁地往河边走,还不停地向对岸挥手。

在联欢会上,李海培认识了拥有迷人笑容的混血少女韩雪。韩雪告诉她,在通辽读大学的时候,俄罗斯留学生把她当成老手,可发现她不会说俄语,也未去过俄罗斯。而中国同学又都把她当成外国人,准备跟她用英语交流,没曾想,她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特别的文化身份和归属感的困惑,让她选择回到桃花源般的家乡,和家人一起生活。

“2011年,我以行走边疆拍摄到的一手素材和故事样片参加一项由德国和丹麦的纪录片

机构组织的国际交流活动。我再次驱车2200公里,专门去室韦拍一些素材。但是两年之后的室韦变化太大了,变得特别商业化,到处搞基建,盖大酒店,当年开联欢会的江边草坪也变成了毫无特色的水泥地广场。”

最让李海培难过的是,韩雪也不再那么开心了。

“她仍像两年前一样手脚不停地招呼着客人,却没有了当年灿烂的笑容,偶尔挤出一丝礼貌寒暄的微笑,瞬间就会习惯性地眉头紧皱,并且不再接受我的摄像机镜头。”说起韩雪的变化,李海培的语气中透出无奈。

与死神擦肩

走完中俄、中蒙边境,李海培回到北京休整,补充装备向雪域高原进发。

西藏不像东北,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边境线,大多数时候,绵延的雪山就是一道天然的“边境铁丝网”,高原上生活的所有藏民也都成了李海培《边疆问路》所关注的对象。

然而,西藏之行对于李海培来说却并不是那样顺利,从拉萨出发后的首站纳木错,就让她与死神擦肩而过。

“纳木错附近有一座神山,生活在这里的藏民劳作结束后,都会在下午来这里转山。我边跟拍转山的藏民,边寻找会说汉语的藏民聊上几句,不知不觉中,走了四个小时才把这神山转完。我当时拍得太投入了,忘了自己是刚到高原地区的第四天,这样消耗体力是非常危险的。”夜幕降临后,李海培开始感到头疼。本以为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接下来高原反应却越来越厉害,头痛欲裂,呼吸困难,想睡觉却怎么也睡不着。

大概到了夜里十一点多,可怕的麻感迅速窜遍全身,胸前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仿佛自己正一点点被活埋。始料未及的变化让李海培感到害怕,她使出浑身力气呼吸,幸好帐篷之间相隔较近,很快,周围的人都赶了过来。紧急施救后,来自香港的一对父子连夜将她从海拔4900米的纳木错,送回了海拔3650米的拉萨。

“拉萨的医生说,我这是急性高原缺氧,及时下撤是明智之举,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那段时间都不要再去海拔5000米的地方了。”

听从医生的劝告,李海培暂时放弃了去海拔5000米的阿里地区采访拍摄著名的中尼、中印普兰口岸和神秘的古格王朝与狮泉河的计划,转而而去中尼边境口岸樟木。

樟木的平均海拔只有2300米,当地原住民是夏尔巴人,属于藏族的一个分支。“尼泊尔人中也有部分夏尔巴人,他们多数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脚附近,是世界著名的登山向导。除了夏尔巴人,不少汉族人在樟木开店、做生意,促进了这座边境的繁荣。”李海培说。

在街边一座供奉着巨大转经筒的寺庙里,守庙的夏尔巴妇女会说一点汉语。她告诉李海培,自己心脏不好,经常要去加德满都看病,因为那里比拉萨要近些,又是尼泊尔的首都,有不少外国医生,医疗水平也不错,去拉萨的话反而要翻过海拔5000米的雪山。她还收养了一个失去父母的尼泊尔孩子,刚刚十岁。

邻国的资源设施给边境百姓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和平与商贸往来,也为两国边民提供了交流发展的契机。“在樟木,我遇到一个来中国做服装生意的尼泊尔人,他告诉我,他的家就在山的那边,从山下口岸过关就是。如果想来,一天之内就能回去。”

嫁来中国的外国媳妇

穿过雪山和冰川群,在金黄色的油菜花和紫色的山花迎接下,李海培到达位于西藏东南角、与邻国印度和不丹接壤的亚东。而后,又回到拉萨,坐上长途客车,一路东行,走滇藏线前往云南,并在大理转车去到中缅边境。腾冲县的滇滩镇,是中缅边境的一个口岸小镇。

“滇滩镇的边境口岸连着缅甸的板瓦。镇居民只需要办个边民证就可以方便地出入境,去邻国购物、探亲访友、做些小买卖,两国通婚的现象也很普遍。”李海培介绍。

东江温就是嫁过来的缅甸媳妇,她除穿了一条缅式长裙外,长相和中国人没多大区别,也会说汉语。“我问她喜欢生活在中国,还是生活在缅甸?正在剥玉米的她不假思索地说:‘一样。’缅甸也是要受苦受累,中国也是要受苦才有得吃,都一样!”



在云南省最南端的中老边境小镇磨憨,更多的老挝姑娘,愿意嫁到中国来。

意外受伤的李海培,拖着伤脚一瘸一拐地到达磨憨,正好赶上了一月一次的赶摆。这一傣族百姓的风俗,原本就是一种集市,却因在边境,成了中老友好互市的好机会。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到处是盛装打扮的傣族、哈尼族、苗族村寨的边民们。曾去北京找过工作的克木族小伙儿阿东,妻子就是老挝姑娘。他很快和李海培成为了朋友,不仅邀请她到自己所在的南欠村住下,还请受雇于他的老挝雇工阿里带她过境到老挝那边看看。

“从阿东家到阿里家,骑摩托车需要20分钟,却像间隔了几个世纪。南欠村一座漂亮的傣式小楼灯火通明,家家户户响着电视的声音。而阿里家所在的老挝村寨没有通电,当地风俗规定,女人是不能与客人同席用餐的,他们安安静静地站在黑暗的屋角,拿着手电筒帮我们照明。”

离开老挝村寨时,他们在村口碰到了找朋友谈恋爱的老挝年轻人。阿东半开玩笑地对李海培说:“我们得快点走,你要是个男的,就走不了!这里的老挝姑娘都会围过来,求着你娶她们,把他们带去中国。她们特别想嫁到中国来的。”回到中国,想起老挝村寨里那些用脖子夹着手电筒切黄瓜的姑娘们,李海培把自己随身带的头灯送给了阿里,请他转交给他的妻子。

继续向东,抵达云南最早的边贸口岸之一河口,口岸的繁忙与拥挤,令李海培吃惊。“河口对面是越南老街省的首府老街市。每天早上,8点的升旗仪式之后,口岸开关,大批早早就候过关的越南边民从桥对岸奔跑而来,背着大小箩筐,推着三轮,开着巨大的编织袋,来抢购商品。河口这边开着商铺的中国商人们,则从容地发货、点钱,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一位来自青岛的商人告诉李海培,他到河口做生意已经七八年了,生意还不错,“越南人不生产,什么都靠从中国进口,连水果都是。”

一路走来,李海培都带着一个关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得到了各种朴实的答案。当她把这个问题抛向这位青岛商人时,他笑笑,慢条斯理地说:“钱多钱少,常有就好。家穷家富,快乐就好。这就是幸福。你说对吧?”短短两句话,简洁明了。

“生活在边境的人,他们更容易满足,幸福感很强。他们没有太大的奢望,只要家里人在一起,最多想再搞搞旅游业,赚些外快就很开心了。”李海培说,问了一路“什么是幸福”,回来后,她才发现一路上都很幸福,“我干了我喜欢的事,我觉得我这辈子没白活。”

让梦想照进现实

结束边境之行最后一站广西凭祥的行程,李海培带着丰富的素材回到了北京,一边在家静养脚伤,一边着手剪辑制作。由于没有多余的资金,撰稿、剪辑、配音、配乐、翻译、字幕等所有工作都亲力亲为,每天工作18个小时。

“有一天我收到一条手机停机前的提醒短信,要去交费的时候,发现找遍自己所有的银行卡,居然只剩下83元钱,终于强烈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经济危机,必须加快后期制作的速度了。”李海培请了一位刚毕业的姑娘帮她切镜头、记场记,一位剪辑师朋友免费帮她做了片头的地图动画,一位作录音的大学同学也慷慨相助,免费帮她录了样片的配音。5个月后,《边疆问路》终于制作完成。

“起初,我抱着《边疆问路》,去电视台寻求播出渠道,均一一碰壁。”李海培说,虽然《边疆问路》这个片子最后只在杭州和香港的电视台播出,并在网上传播,在人大出版社出版了DVD,基本上是血本无归的,“但是它给予我的东西远不能用来衡量,它给了我内心的力量,让我很坚信我要走这条路,而且更让我坚信,纪录片这个事业我能够走下去。我也开始去思考,怎么让纪录片与市场结合,对我来说这也许是个长期的课题。”

采访结束时,李海培邀请记者一起去楼下的早教中心看看儿子。正在玩玩具的孩子看到妈妈来了,笑弯了眼睛,咧开小嘴巴,扭动着身子伸手要妈妈抱。李海培赶紧抱起孩子,轻柔地安抚着,眼睛里满是慈爱的光。